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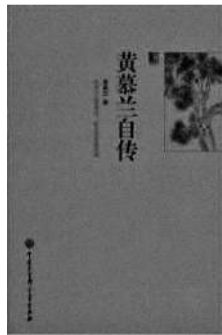


1949年之前,年轻美丽的黄慕兰以名媛的身份周旋于社交圈,暗中却从事着革命工作。



黄慕兰 红色女特工的传奇人生

她是郭沫若长篇小说《骑士》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,她是《风声》中女主角的原型,她今年106岁,她以百岁人生见证了中国的世纪之变,她曾经默默无闻。打开《黄慕兰自传》,这位至今仍然健在的红色女特工用自己的故事,给读者带来另一个层面的中国革命史。回望80年前,年轻的黄慕兰在变乱时代的人生选择,至今看过去,依然惊心动魄……



《黄慕兰自传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。

痛恨军阀,一生坎坷

生于清光绪年间,是父亲的长女,祖父逝世时预言她的一生坎坷,不过晚年将很幸福。喜欢花木兰事迹,参加革命改名慕兰。

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,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皇家祠堂里出生的。我是长女,父亲因为三十多岁才有女儿,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。我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,正逢两派军阀湖南混战,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,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,奸淫掳掠。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,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,使我萌发日后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。

逃难后不久,在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人来,接我们全家到武昌居住,只有祖父年老恋乡,不肯同行。我因为喜欢花木兰事迹,后来改名慕兰。我十七岁那年祖父逝世,他把我叫到床前说:“你是我的长孙女,我最喜欢,你是生不愿来,死不愿去(我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出来)。但你的一生很坎坷,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。”

婚后一年,丈夫牺牲

1927年三八妇女节那天,我和宛希伊在武汉结婚。一年后,丈夫壮烈牺牲。

6月中旬我们辞去各项职务。7月中旬,中共中

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。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转达的党组织意见,要我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。父母为我们保守秘密,对外说我“已经出国留学了”。

我们登船前都化了装,希伊穿上长衫马褂像个商人,我梳了个巴巴头,装扮成家庭妇女。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。希伊警惕性很高,对我说“下船后,不要直接去南昌,我们到庐山去玩吧。”到了九江后,南昌有人来接,我们悄悄告诉来人恐怕有坏人盯梢,要想法子甩掉他们。

我在南昌的具体工作之一,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。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“王麻子”,名字不记得了;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;还有位同志叫曹策。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,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,都是见面时传递的。

1928年1月,希伊接到中央调令,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。当时我已分娩,生下杰儿只有三天,不能随他一起走。临走前希伊说,万一他有不测,就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抚养,长大了好继续革命。7个月后,饶漱石告诉我希伊在5月时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,壮烈牺牲。

轻生被救,重回组织

到上海后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。经周恩来

同意,与贺昌结成革命伴侣,其间遭遇压力,轻生纵身跳入黄浦江。

1928年我到上海后分配在中央书记处工作,中央政治局开会,我是做记录的秘书。我从陈潭秋那里学了一套自己创造的速记符号,我也是这样做会议记录,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。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碰到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贺昌问是否可以和我结成革命伴侣,我说要向周恩来汇报。恩来听说后很赞成,我们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。

听说我们结婚,同志们纷纷道贺,只有饶漱石对我冷嘲热讽,说我是攀高枝。我听后很生气,第二天政治局开会后我坐人力车回家,还在独自生闷气,竟然把小包落在车上,包里有本会议记录簿。我一路往回追,也没追到那辆人力车,我走在黄浦江边,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受批评,就产生轻生念头,纵身跳入黄浦江。

我在水里沉浮时,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发现救了上来。他们问我为何轻生,我已经头脑清醒,明白不能吐露实情,就说因为失恋了,从南京到上海找表哥,表哥搬家没找到,身上皮包又被偷走,身无分文。他们问我表哥姓名,我把平时联系的一个地下交通员张国华的化名说出。第二天《申报》刊登了“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”的报道。恩来理解联想到这应该是我,就让张国华以表哥身份将我带回来。

领导罢工,狱中助串供

1929年被囚禁百天期间,被捕的八个人团结在狱中,互通消息,保护革命的种子。

1929年春,经过江苏省委安排,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工,后来又转到浦东进了恒丰纱厂。我在两个工厂都参与了散发传单的任务,曾经因为饭篮子里有张传单被巡捕抓了。在法官面前我说自己根本不识字,传单是捡来的,为了包粽子。法官很严厉地问我:“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,你听了什么人指使?”我抬起头,土头土脑,慢吞吞回答:“法官老爷,什么党呀?我是刚从乡下来,什么都不知道,这纸上写得什么呀?”因为我装得很像,庭上的律师帮我辩护,我就当庭释放了。

但是后来在恒丰纱厂我参与罢工又被抓进龙华监狱关了起来。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非常团结,我那时怀孕了总是呕吐,就帮着狱中的一个我们认作“干娘”的自愿牢犯帮忙拆洗犯人的衣服。我洗之前都很认真检查,有时会发现阵之用法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。比如:“我是七零四号,请帮我找到同时被捕的七零五号,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?”显然是为了口供一致。我就会把七零四号的纸条放入七零五号的衣服中,让他们互通消息。

救周恩来,接关向应

上海向忠发叛变,我给

潘汉年打电话,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。

1931年1月,党组织决定调派我担任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。而贺昌则瞒着我向中央申请到苏区工作,他的申请获批后我才知道,我坚持还是听劝留在了上海。1931年深秋,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。那年5月,他已经被送到郊区一处秘密接待站居住,但每周会来看我,同时也是打听对关向应的营救进展情况。

临行前他向我辞别时,我在楼上听见陈志皋坐的小轿车喇叭和发动机的声音,我叫贺昌赶紧躲到卫生间去。陈志皋是关向应的辩护律师,他家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。我因为机缘巧合,还被陈老太爷收做了干女儿,组织上认为这门干亲,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,所以给我备了厚礼,到陈家正式举行了拜见仪式。当然陈志皋和陈家上下都不知道我的共产党身份。

后来我想到了(叛变的人)应是向忠发。那天陈志皋本来还想拉我晚上去看电影,我装作头痛病发作先回了家。回家后我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。我们见面后,我催他赶紧向组织汇报情况。当时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知道情况后,叫李富春、蔡畅等转移到都城饭店暂避。

(下转 C03版)